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6, 15(11), 206-211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6.1511527

Hans汉斯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视域下“投资于人”的哲学意蕴

陈丽梅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2026年10月13日；录用日期：2026年11月4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17日

摘　要

当前宏观发展政策提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一重大命题，其理论根基深植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之中。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出发，“投资于物”在本质上是对劳动资料的系统性配置，构成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基础；“投资于人”则指向劳动者能力素质的培育与提升，是生产力中最活跃要素的能动激活。二者并非外在并列关系，而是手段与目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在生产力构成中，劳动者始终是能动的主体要素，物的要素唯有通过“活劳动”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一理论逻辑表明，“投资于人”不仅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当代践行，更是人本逻辑在生产力领域的价值彰显，最终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根本旨归。

关键词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投资于人，唯物史观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Investing in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Limei Chen

School of Marxism,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October 13, 2026; accepted: November 4,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17, 2026

Abstract

The current macro development policy proposed the close integration of “investing in things” and “investing in people.” This proposition has a profound Marxist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rom the

文章引用: 陈丽梅.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视域下“投资于人”的哲学意蕴[J]. 哲学进展, 2026, 15(11): 206-211.
DOI: 10.12677/acpp.2026.1511527

perspective of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investing in things" is essentially the systematic allocation of the means of labor, constituting the materi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investing in people" points to the cultivation and enhancement of laborers' capacities and qualities, representing the dynamic activation of the most active factor in productive forces. The two are not externally juxtaposed but are dialectically unified as means and end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In the composit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laborers are always the dynamic subject, and material factors can only be transformed into real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living labor." This theoretical logic demonstrates that "investing in people" is not only a contemporary implementation of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but also a value manifestation of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philosophy in the realm of productive forces, ultimately pointing to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Keywords

Marx,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Investing in Peopl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投资，说到底是一种资源配置行为。但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语境里，它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算计。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写入了“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1]。将这两个“投资”并列提出，在学理层面折射出我国宏观发展理念的深层转向。若要深入剖析这一转向，仅依赖西方经济学中的资本积累模型显然具有局限性。因此，有必要回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特别是他的生产力理论中去寻找最根本的哲学根基。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学界在讨论投资问题时，往往把“投资于物”简单等同于修桥铺路、购买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把“投资于人”看作单纯的人力资本培训。这种看法虽然指出了表面现象，但不够深刻。马克思在剖析劳动过程时早就指出过，生产力绝不是死板的物质堆砌，它是劳动者借助劳动资料去改造劳动对象的能力系统，而且在这个系统里，人是起主导作用的[2]。张志勇、张姚对此有很精准的概括，他们认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提出，是唯物史观中“人是历史创造者”这一核心命题在当代的时代呈现[1]。张三元也进一步指出，这个命题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它坚持了物质生产与人的发展的统一，把人的全面发展当成了根本的落脚点[3]。

事实上，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确实主要依赖“投资于物”来拉动经济增长。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园区开发和固定资产投资，迅速改变了国家面貌，为中国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种传统模式的局限性开始显现。一方面，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逐渐递减；另一方面，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高素质技能人才短缺等问题日益突出。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理念上必须实现根本性的突破，不能继续沉迷于短期的物质扩张，而是要重新审视并高度重视“人”的因素。从历史的演进规律来看，将重心转移到“投资于人”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结合于春海在《求是》专访中的观点来看，当前之所以要特别强调“投资于人”，本质上的原因在于

[1]https://qikan.cqvip.com/Qikan/Article/Detail?id=7204097901&from=Qikan_Search_Index

我国经济发展的要素禀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那种靠廉价劳动力和大规模物质资本投入的粗放型增长已经遇到瓶颈，现在需要依靠劳动者素质的提升来对冲传统物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4]。顺着这些学者的思路往下推演，我们运用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去透视“投资于人”，它的哲学意蕴其实非常清晰：这就是对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要素的自觉培育。

2.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中“物”与“人”的辩证关系

想要彻底厘清“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深层关系，我们需要回到《资本论》里的经典论述。马克思在分析劳动过程时，高度提炼了三个简单要素：“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5]。在这个经典框架下，所谓的“物”，对应的主要是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它们是客观存在但死的东西；而“人”，则是从事劳动的活的主体，是活劳动。这两者在生产力系统里的地位和作用是完全不同的。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劳动过程不仅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更是人类有意识地改造客观世界并在这个过程中确证自身本质力量的活动。如果脱离了“活劳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就仅仅具有潜在的使用价值，无法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要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劳动资料反而成为了支配和剥削劳动者的异己力量，这就是马克思深刻批判的劳动异化现象。在超越资本逻辑的新型社会形态中，应当扬弃这种异化，使劳动资料重新复归其服务劳动者、促进劳动者发展的本来位置。因此，厘清“物”与“人”在劳动过程中的主次关系，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关系到我们如何破除资本逻辑、坚持坚持人民主体性的发展实践问题。

一方面，劳动资料是生产力发展中必不可少的客观尺度。马克思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论断：“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5]。从早期的手工织布机，到后来的蒸汽机，再到现在的智能算法平台和自动化流水线，每次生产工具的跃升，都意味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跨上了一个新台阶。这就意味着，“投资于物”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最基础的物质前提和硬件支撑。如果没有这些物质技术条件，再好的想法也只能是空中楼阁。祝林林在文章里借用“两种生产”理论也指出，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本身就是人类社会存续和发展的客观要求[6]。

但另一方面，马克思真正深刻的地方在于，他从来不认为“物”能自己凭空产生价值。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生动地比喻：“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7]。机器设备再好，也是人造出来的，里面凝结着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如果脱离了劳动者的现实参与和实践操作，再高级的机器也无法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得很透彻：“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5]。这句话直接说明了问题的实质：在生产力中，人永远是能动的一方。物的要素必须经过“活劳动”的点化和激活，才能从潜在的使用价值变成真正的生产力。

弄清了这一点，“投资于人”的哲学底蕴就完全出来了。如果说“投资于物”是创造客观条件，那“投资于人”就是培育能动主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强调过，“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2]。劳动者的知识储备、健康状态、创新想法和实践技能，直接决定了那些物质条件能被开发到什么程度。周泉从现代化演进的角度分析得很对，“投资于物”是客观前提和物质确证，“投资于人”才是主体依据和价值归宿，因为物最终是要为人服务的[8]。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视域中，人与物相互依存，但在价值序列上，人的主体地位优先于物的客观要素。

3. “投资于人”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当代发展

马克思当年主要面对的是 19 世纪的大机器工业，那时候工人往往被机器(死劳动)支配，甚至沦为机

器的附属品。但现在的时代不同了，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飞速发展，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这就给“投资于人”赋予了更强烈的现实意义。侯惠勤在探讨新质生产力时强调，它的基本内涵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这深刻体现了唯物史观中生产力与人的发展相统一的逻辑[9]。刘同舫也提醒我们，不能孤立地看生产力，要在“能力论”和“力量论”的统一中去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征[10]。

在当代，人的素质直接决定了生产力发展的天花板。过去，技术进步主要靠工具的更新换代，工人跟着机器转。现在搞新质生产力，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现在的大数据、大模型、人工智能，如果没有人去写代码、去训练、去调整参数，它自己什么都不是。马克思当年说过，“个人的充分发展”是“最大的生产力”[5]。这一论断在当代知识经济语境下更具解释力。当前的“投资于人”已超越了传统的社会福利或基础教育范畴，日益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竞争的关键变量。特别是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经济格局，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趋势也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退，我们必须转向人才红利。这就意味着，单纯依靠劳动力数量堆积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的增长动力必须来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则在于科技创新和劳动者素质的跃升。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正是对这一时代趋势的精准回应。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就必须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加大对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的投入，培养出大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可以说，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谁能在“投资于人”上抢占先机，谁就能在激烈的全球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祝林林认为，“投资于人”就是要解放和培育现实的人的本质力量，这是对生产力核心要素的精准赋能[6]。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投资于人”，跟西方经济学讲的“人力资本”有本质区别。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像舒尔茨、贝克尔他们)也讲教育投资，但骨子里是把人当成一种能带来利润的“资本要素”，算的是投入产出比，人变成了赚钱的工具。有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就专门辨析过，马克思讲的是活劳动创造价值，人的劳动能力才是最革命的因素[11]。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投资于人”，落脚点不是把人变成更好用的商品，而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张三元说得好，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3]。这正是超越资本逻辑主导模式的制度基础所在。

4. 手段与目的的统一：“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辩证关系

既然两者都重要，那在实际操作和政策制定中怎么平衡？这就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里找答案。

首先，从手段和目的的关系看，它们是高度统一的。“投资于物”是手段，建高铁、建算力中心，是为了让人有更好的活动舞台和物质条件；“投资于人”是目的，因为发展的成果最终得由人来享受。但有趣的是，在这个辩证法里，“目的”同时也会变成最高效的“手段”。当劳动者的素质提高了，创新能力爆发了，反过来就会极大地推动技术和设备的迭代升级。张志勇、张姚就把这两者的统一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手段与目的辩证法的具体体现[2]。

其次，我们得客观承认，这俩之间是有张力的，也就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搞物质投资，资本天然追求效率和利润，容易异化成“见物不见人”；而搞人的投资，见效慢，看重的是长远价值和社会效益。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就深刻揭露过这种异化现象：“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7]。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形态中，这一矛盾呈现出难以调和的特征。然而，在扬弃资本逻辑的现实制度框架下，这种张力具备了被超越的制度基础。李帮喜指出，立足公有制经济的本

[2]同脚注 1。

质要求，我们是可以超越资本逻辑的，能让“投资于人”真正成为生产的目的，从而把工具理性重新约束在价值理性的框架里[11]。深入来看，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社会，其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价值增殖，劳动者仅仅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被纳入生产体系，其自身的全面发展往往被忽视甚至牺牲。而在超越资本逻辑的新型生产关系框架中，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转向了满足人的真实需要与全面发展，而非单纯追求资本增殖。这种根本目的的不同，决定了我们能够妥善处理好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工具理性的作用，毕竟物质财富的积累和效率的提升是改善民生的基础；但同时，我们更要坚持价值理性的引领，确保物的增长最终转化为人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政策时，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既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民生账和长远账，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衡量一切投资成效的最终标准。唐柳和黄瑾也认为，这种超越体现了“两个结合”的标识性意义，让物的丰富真正服务于人的发展[12]。

最后，这两者的结合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不是一开始就并驾齐驱的。孙存良、张飞雪在《光明日报》的文章里讲得很清楚，“投资于物”是基础支撑，“投资于人”是活力源泉，缺一不可[13]。从历史演进脉络来看，相关理论论述也提到过，早期我们底子薄，必须先把物质基础打牢，等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民生投入跟上了，到现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就必须把“投资于人”放在战略提升的高度[3]。周涛从物质生产、时间历史、空间场域和人民立场四个维度所做的分析[4]，以及陆文涛、高璇针对当前现实梗阻提出的实践路径[14]，其实都印证了：这种多维度的实践，必须依靠科学的方法论和精准的现实抓手，不能偏废。

5. 结语

提出“投资于人”，看似是经济账本上的一项政策调整，但从根子上说，这是发展哲学的一次重大转向。用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来观照，劳动者始终是那把解开生产力密码的钥匙。没有人的活动，物的要素就没有灵魂；离开了人的发展，经济的增长也就失去了意义。

马克思在展望未来时曾指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5]。“投资于人”的深层意义在于，它通过向教育、医疗、健康等领域投入资源，最终指向了人类自身创造力的培育。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是夯实社会发展根基、迈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

客观而言，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本文主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规范性的理论推演，尚未能够引入大规模的经验数据与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此外，“投资于人”的政策效果往往具有滞后性，本文未能对“投资于人”在多大程度上量化贡献于“人的全面发展”构建起精确的评估指标体系。未来的研究可尝试结合面板数据与微观调查数据，探索建立“投资于人”的综合评价模型，以期对相关理论的现实解释力进行更为科学的验证。

致　谢

感谢导师田明教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指导，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中疏漏之处，由作者本人负责。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EB/OL]. https://www.12371.cn/2025/10/28/ARTI1761640401107119.shtml, 2025-10-28.

[3] https://www.qstheory.cn/dukan/qs/2024-11/15/c_1130219268.htm
[4] https://qikan.cqvip.com/Qikan/Article/Detail?id=7203331964&from=Qikan_Search_Index

[2]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 [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31.

[3] 张三元.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唯物史观阐证[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6(3): 25-35.

[4] 陈有勇. 为什么提出“投资于人” [J]. 求是, 2025(23): 52-56.

[5] 马克思, 恩格斯. 资本论: 第 1 卷[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07-214.

[6] 祝林林.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唯物史观意蕴[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 43(3): 15-25.

[7]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92.

[8] 周泉.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唯物史观阐释[J]. 新疆社会科学, 2026(2): 1-8+190.

[9] 侯惠勤. 试论新质生产力对唯物史观的发展[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4, 9(5): 4-16+125.

[10] 刘同舫. 以唯物史观理解新质生产力[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4, 10(4): 27-36.

[11] 李帮喜. 立足社会主义本质把握投资于人的科学内涵[EB/OL]. 2026-09-18.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609/t20260918_6067830.shtml, 2026-11-11.

[12] 唐柳, 黄瑾. 投资于人: 彰显“两个结合”的标识性概念[EB/OL]. 2026-09-21.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609/t20260921_6068158.shtml, 2026-11-11.

[13] 孙存良, 张飞雪. 深刻理解和把握“投资于人”的丰富意蕴和实践要求[N]. 光明日报, 2025-10-21(006).

[14] 陆文涛, 高璇. 以投资于人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生成逻辑、现实梗阻与实践路径[J]. 团结, 2026(1): 31-34+37.